

長平之戰（前260）： 大戰略失調所導致的軍事災難

謝偉傑

緒論

人類歷史上充滿各種災難，「大惡有四，兵，病，水，火」。¹還有地震、旱災等等，既有天災，也有人禍，有時兩者難以清楚劃分。²在這些災難中，要說最具戲劇性，也最具預知性的，莫過於軍事災難（military disasters）。³說其具戲劇性，是因為戰場上瞬息萬變，勝敗往往取決於俄頃之間，一個決定足以扭轉成敗，災難也可因此轉移或避免；⁴說其最具預知性，是因為戰爭是交戰雙方的角逐和火併，戰場上的每一個參與者均清楚認識到戰敗意味著災難的降臨，這一災難是可以預知必然會出現的，雖然未必可以準確預知發生在哪一方身上。同時，軍事災難建基於一種互動關係，也是一場利益上的零和遊戲。說是互動關係，因為交戰雙方

¹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3。

² 以古代農業社會為例，人們會因為忽視水利工程，而在暴雨時引起河水決堤、泛濫的災害；忽略積穀防饑或官吏侵吞倉儲，以致在農業歉收或旱災時，引發大規模的饑饉。有關中國的史例，可參考陳高備：《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1939年；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複印）。

³ 軍事上的失敗可分為不同層次，最輕微的挫敗，是失敗的一方可迅速復原；最嚴重的失敗即為軍事災難，戰敗的一方損失慘重，甚至導致政權的崩潰，而要擺脫困局，非依靠外力援助不可。Eliot A. Cohen and John Gooch, *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0) 是西方學界第一部系統研究軍事災難的專著；應用軍事災難的概念於中國史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則為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⁴ 例如公元383年的前秦、東晉的淝水之戰中，苻堅下令軍隊退後，讓晉軍渡河，這一決定最終導致前秦軍的全線崩潰。又例如在1940年5至6月間，若不是德軍統帥部因為一時狐疑，決定以空軍和步兵取代裝甲部隊對英、法軍隊進行追擊，在敦克爾克（Dunkirk）等待撤退到英國的三十多萬盟軍，恐怕難逃滅頂之災。

均會因應對手的行動作出反應，致力將災難加諸對方身上，以圖擊敗對手；說是利益零和遊戲，是因為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格局，一方取得勝利，另一方必然歸於失敗。⁵此外，軍事災難導致一個政權的崩潰、覆亡也常較其他災難來得更直接、更迅速。⁶軍事上失敗的程度越大，災難的程度也越大，其影響亦越大。

人們在探究軍事災難發生的原因時，常常會把戰敗的責任放在處於戰場前線的指揮官身上。中外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前216年的坎尼會戰 (Battle of Cannae)，羅馬軍團遭遇大屠殺，就是因為羅馬指揮官的盲目自信；前260年的長平之戰，趙軍慘敗，是因為主帥趙括無能；漢高祖被匈奴圍困於白登山 (前200) 是因為他不聽勸告，輕率冒進；前趙和後趙的洛陽決戰 (328)，劉曜潰敗被擒，是因為他陣前醉酒；法軍在1415年於阿金科特 (Agincourt) 慘敗於英軍手上，就是因為法王亨利六世 (Charles VI, 1380–1422年在位) 錯誤地把重鎧甲部隊配置在不合適的地形作戰；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戰役的第一天 (被稱為英軍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的鉅大傷亡，就是遠征軍司令黑格 (Douglas Haig) 的不濟所致。我們當然不否認將領的一念之差可以招致戰爭的失敗，但若把軍事災難單純地歸咎於前線的指揮將領，往往未能讓我們對軍事災難的成因得出系統的、多角度的認識。在負責指揮的將領背後，我們還應該看到國內的軍事與政治決策系統對前線軍事行動的影響。

戰國後期，秦、趙之間爆發的長平之戰，趙軍慘敗，死亡人數據載高達四十多萬。一年後，秦軍圍攻邯鄲，展開了一場牽涉秦、趙、魏、楚的邯鄲保衛戰。邯鄲雖保不失，但長平之戰的後果，足以令戰國後期稱雄北方的趙國實力大減，助長了秦統一天下之勢。誰要為這場趙國的軍事災難負責呢？趙軍統帥趙括不可避免地成了罪魁，留下了「紙上談兵」的千古罵名。然而，單憑趙括的無能，就足以解釋趙國之敗嗎？

⁵ 戰爭的勝利不是純粹的在戰場上的勝利，還要視乎其影響，以及取決於不同層次、不同的人 and 時代對甚麼是勝利的認知。例如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43–1715在位) 於1688年開始，發動了針對以哈布斯堡帝國為首的同盟的戰爭，直至1697年，法軍幾乎未嘗一敗。然而，戰爭對法國造成了極大的消耗，終於迫使路易十四與對手簽訂和約，甚至放棄了許多他從1678年以來取得的利益。又例如美國在越戰中取得了一連串戰術上的勝利，但卻在戰略上失敗了。從以上兩個例子中可見，勝利與失敗並不是絕對的，還要視乎從甚麼層次或角度作出分析。

⁶ 當然，在遠古時代，一次天災足以摧毀一個文明。但社會逐步發展以後，這樣的情況比較少見，而軍事災難對政權的存亡有更直接的影響。例如中國歷史上，一次軍事災難可導致政權的覆亡，其他災難如旱災、饑荒不會立刻導致現政權的倒臺，當中還需要經過「官逼民反」、宗教號召之類的過程，把不滿的力量凝聚或轉化為軍事力量，並進一步在軍事上擊倒現政權。

筆者希望對長平之戰的背景、趙國決策者的行動，以及相關問題作出系統整理、分析，從而探討趙國戰敗之由。首先從長時段分析秦、趙之間衝突的緣起，以解釋何以一次戰國時期常見的領土糾紛，從有限衝突演變為大規模戰事。接著，試圖分析中央決策者以至戰場指揮官的決策的因由和影響，去探討當中所產生的問題如何導致這場軍事災難。

「持續敵對」視角下的秦、趙關係

長平之戰是秦、趙二國的交戰，其導火線是兩方對韓國上黨郡的爭奪。本來，類似的爭奪土地與人民的衝突，在戰國時代是頻繁發生的現象，不足為奇。何以長平之戰會從一次常見的衝突升級為一場秦、趙「兩強傾其全力的大決戰」、一次「戰國時代從來未有的大戰」？⁷要解答這個問題，不能只注意秦、趙如何爭奪上黨之地，還需要把眼光擴闊一點，從長時段的秦、趙關係作分析。一些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提出了「持續敵對」(enduring rivalries)的概念分析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⁸對本文理解秦、趙的關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持續敵對」是歷史上常見的現象，指國家之間處於不斷發生衝突的狀態之中。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當中必然有雙方爭奪的目標，包括土地、人口、其他物質資源、政治影響力、宗教或意識形態的主導權等。⁹衝突的性質和焦點所在，視乎參與者對利益如何詮釋。¹⁰既然衝突的焦點有可能改變，「持續敵對」關係是否存在，關鍵在於國家之間認定了衝突關係的長期存在，並感受到自身安全正受到威脅。

⁷ 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13。

⁸ Paul F. Diehl, ed., *The Dynamics of Enduring Rivalri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

⁹ Diehl, "Introduction: An Overview and Some Theoretical Guidelines," in *The Dynamics of Enduring Rivalries*, pp. 1-3.

¹⁰ 對於國際關係中的利益如何界定，在現實主義 (realism) 的論述中，認為國家之間競相爭奪權力，權力就是國家所關心的利益所在。不過，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的學者指出，國際關係中對利益的界定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應不同的競爭者而異。對一方是利益所在的事物，對另一方而言，可能一文不值。因此，對利益的詮釋，就取決於當事者的文化、價值觀、歷史經驗的影響、對事物的認知等因素。Peter J. Katzenstein 所編撰的一本論文集，是以建構主義分析國際關係的力作，眾多學者對國家如何界定利益有深入細緻的分析，可參看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另外，Guy Olivia Faure and Jeffrey Z. Rubin, eds., *Culture and Negotiation: The Resolution of Water Dispute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從文化角度對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如何詮釋利益，提供了豐富的事例分析。

因此，敵對者均不放棄對武力的使用和訴諸武力進行解決的意願，並對未來衝突的發生懷有強烈的預期。一般而言，這一敵對關係時間跨越數十年或甚至數世紀，敵對者需要制訂長遠的策略以相對抗。¹¹ 借用「持續敵對」的框架進行分析，不但可以解釋戰爭的起因，更可以解釋敵對關係的成因。

從長時段觀察而言，趙國從晉國析出，而秦國早已與晉國有長久的和戰關係。秦、晉關係與秦、趙關係並非截然不同的兩事，秦、趙關係早在秦、晉並峙時已決定。春秋之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¹² 秦、晉兩國毗鄰，在彼此的擴張過程中，不免發生磨擦，從而展開了長期的和戰關係。

秦、晉的主要矛盾在於秦有東進之心而為晉國所阻遏，由此產生了兩國的「持續敵對」關係。河西之地是兩國衝突的重點。秦的東界與晉的西界在黃河兩岸交錯，雙方均欲控制黃河對岸。當時「晉疆，西有西河，與秦接境」，¹³ 晉佔有河西之地，即已越過黃河，進入關中，對秦國構成莫大威脅。¹⁴

秦國一直希望取得河西之地，晉國對此亦甚重視。獻公死後（前651），晉國陷入君位繼承紛爭。晉惠公為求得秦國的支持，曾對秦穆公承諾：「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¹⁵ 不過，晉惠公既深明河西之地在兩國力量天平上的重要性，在即位後便悔約了。前645年的韓原之戰，晉惠公被俘，其獲釋條件既要以太子為質於秦，還要割讓秦國夢寐以求的河西之地。¹⁶ 晉惠公死後，秦國希望扶植一個親秦的晉政權，因而支持晉文公即位，秦、晉之間亦得以暫時維持良好關係。前630年，秦助晉攻鄭。在圍鄭期間，秦穆公因為鄭使燭之武所言：「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疆，秦之憂也。」¹⁷ 遂先行退兵，其關鍵即為「晉之疆，秦之憂也」。雙方均不欲對方比自己強大，以免打破勢力均衡。兩國之間的戰事一直反覆進行，從下表所列《史記》資料可見一斑。

¹¹ Diehl, "Introduction: An Overview and Some Theoretical Guidelines," pp. 3-6.

¹²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三二〈齊太公世家〉，頁1491。

¹³ 同上注，卷三九〈晉世家〉，頁1648。

¹⁴ 有關河西之地對秦的重要性，見史念海：〈論戰國時期稱雄諸侯各國間的關係及其所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載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39-40。

¹⁵ 《史記》，卷五〈秦本紀〉，頁187；卷三九〈晉世家〉，頁1650。秦穆公支持晉惠公，亦因為惠公在晉國內實力不強，他成為國君反而對秦有利。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僖公九年〉，頁330-31。

¹⁶ 據《左傳》所載，晉國最初贖回惠公的代價更及於河東。及後，晉太子圍入秦為質，秦國才將河東交還晉國，而只保有河西之地。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僖公十五年》，頁367-68。

¹⁷ 《史記》，卷五〈秦本紀〉，頁190；卷三九〈晉世家〉，頁1669。

表一：《史記》所載秦晉交戰編年表 (前672-550)

年份	秦晉交戰情況	資料出處
前672	秦、晉戰於河陽，秦勝。	〈秦本紀〉，頁185
前655	秦穆公領軍攻晉，戰於河曲。	〈秦本紀〉，頁186
前645	秦、晉韓原之戰，晉惠公被俘。	〈秦本紀〉，頁188-89
前627	郟之戰，秦軍大敗。	〈秦本紀〉，頁190-92； 〈晉世家〉，頁1670
前624	秦穆公領軍攻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晉人皆城守不敢出。	〈秦本紀〉，頁193； 〈晉世家〉，頁1670
前623	晉攻秦，取新城。	〈晉世家〉，頁1670
前620	晉襄公死，秦以兵送公子令狐入晉。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軍，秦軍敗。	〈秦本紀〉，頁195； 〈晉世家〉，頁1672
前619	秦攻晉，取武城。	〈秦本紀〉，頁195
前617	晉攻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	〈秦本紀〉，頁195； 〈晉世家〉，頁1673
前615	秦康公攻晉，取羈馬。晉軍擊秦，大戰河曲，晉軍大敗。	〈秦本紀〉，頁195； 〈晉世家〉，頁1673
前601	晉敗秦一將。	〈秦本紀〉，頁196
前580	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	〈秦本紀〉，頁196； 〈晉世家〉，頁1679
前578	晉率諸侯攻秦，秦軍敗走，晉軍追至涇，敗秦軍於麻隧，虜秦將成差。	〈秦本紀〉，頁196； 〈晉世家〉，頁1679
前570	秦取晉櫟。	〈晉世家〉，頁1682
前559	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攻秦，大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渡涇，至械林而還。	〈秦本紀〉，頁197； 〈晉世家〉，頁1683

春秋後期，「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¹⁸ 晉國苦於六卿內鬥，秦、晉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關係一度緩和。然而，秦、晉之間的敵對狀態並不因為晉國的分裂而消失。三家分晉的結果是競爭者雖由秦、晉變為秦、韓、趙、魏，但對河西地爭奪的格局，以及三晉阻止秦國東進的實質並沒有改變。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有感「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宣言：「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

¹⁸ 同上注，卷五〈秦本紀〉，頁197。

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¹⁹可見孝公強調秦國東進之意。秦國不斷東進，²⁰晉國極力阻止，雙方不論在預期上或是實際上，均願意訴諸武力以解決糾紛，造成兩國的「持續敵對」狀態。

穆公稱霸西戎，為秦國發展第一個高峰。他雖得志西方，卻受阻於晉國，未能如願東出。李斯曾指出，「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的原因即為「諸侯尚眾，周德未衰」。²¹究其實，是「東侵之路，為晉所扼。終春秋之世，秦人未獲逞志於東方」。²²穆公以後，秦國一度中衰。孝公即位，銳意革新，任用商鞅推行變法，秦國逐漸強盛，東進之心更熾。上引孝公即位後的宣言已表明秦國東進的願望，商鞅自言游說孝公的過程亦表示秦國稱霸之心的急切：「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夫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²³秦孝公對三代帝王之道無甚興趣而欣然接受商鞅的強國之術，反映他亟欲稱雄，只爭朝夕的決心，亦反映他注重快速達致實效的心態。

其後，秦武王明言：「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為何要「窺周室」？張儀對秦惠文王說，「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²⁴正好為秦武王的心願下一注腳。周室所在不論在地理上和時人心態上，均是「天下之朝市」，秦國自然汲汲於取之而後快。戰國時人已指出「秦之欲伐韓、梁，東窺於周室甚，惟寐亡之」。²⁵秦昭襄王在位時，國力強盛，對外侵略的野心更大，對山東六國施以極大的軍事壓力，甚至一度稱帝，其宰制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秦國「雜戎狄之俗」，²⁶文化較東方諸國落後，成為秦國被歧視、懼怕的重要心理因素。下表搜集《史記》中所載一些時人對秦國的批評，可見時人鄙夷秦國之一斑。

¹⁹ 同上注，頁202。

²⁰ 秦國不斷沿渭水河畔向東擴展，共遷都五次，至前305年才定都於咸陽。秦人不斷東進遷都，既反映了他們牧馬民族的不定居習俗，也顯示了他們不斷向東擴展的意欲。

²¹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頁2540。

²²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4。

²³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頁2228。

²⁴ 同上注，卷五〈秦本紀〉，頁209；卷七〇〈張儀列傳〉，頁2282。

²⁵ 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一八〈趙策一〉，頁650。

²⁶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頁685。

表二：《史記》中所見時人對秦國的批評

時人	對秦國的批評	資料出處
楚臣昭睢	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	〈楚世家〉，頁1728
魏信陵君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	〈魏世家〉，頁1857
蘇秦	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仇讎也。	〈蘇秦列傳〉，頁2261
楚威王	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	〈蘇秦列傳〉，頁2261
蘇代	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蘇秦列傳〉，頁2271
游騰	秦，虎狼之國。	〈樗里子甘茂列傳〉，頁2308
蘇代	秦，虎狼之國也。	〈孟嘗君列傳〉，頁2354
梁大夫須賈	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	〈穰侯列傳〉，頁2326
藺相如	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頁2441
魯仲連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魯仲連鄒陽列傳〉，頁2461

秦國不斷被批評為「虎狼之國」，²⁷ 是不可信、不可親的，魯仲連更揚言義不帝秦，對秦國深惡痛絕。秦國在春秋時期，尚未見其成為東方諸國的嚴重威脅；及至商鞅變法後，國力日強，加上其落後、野蠻的形象，以及其東進的野心，對山東諸國構成莫大壓力，搖身一變而成為諸國懼怕的對象。力量的消長是雙向的，秦國力量日益強大之時，山東諸國就相對寢衰。

在此宜對長平之戰前，秦國與山東六國實力的消長略作分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²⁸ 秦既有地形之利，「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²⁹ 復經商鞅變法，國力日強。蔡澤稱頌商鞅對秦的貢獻云：「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

²⁷ 對於秦被稱為「虎狼之國」的詳細分析，可參何晉：〈秦稱「虎狼」考：兼論秦文化遇到的對抗〉，《文博》1999年第5期，頁41-50。

²⁸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頁685。

²⁹ 同上注，卷七〇〈張儀列傳〉，頁2289。有關秦國處關中的地理優勢，可參饒勝文：《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頁16-36。

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畜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³⁰ 商鞅厲行耕戰之策，以軍功爵為鼓勵，使秦國走向軍國之路。³¹ 秦軍戰鬥力大增，秦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鬥」，³²「其人不讓，皆有鬥心」。³³ 張儀在恐嚇韓王時便說：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跼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跋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³⁴

張儀之說或有游士說客誇張之辭，但指秦軍強勁，當離事實不遠。秦兵作戰時如狼似虎，戰鬥力強，對東方六國戰士構成心理壓力。其後的范雎也說：「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施韓盧而搏蹇兔也。」³⁵

秦惠文王時，用司馬錯之策，攻取巴蜀之地，對秦國的發展尤為有利，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³⁶ 秦國國力更盛，對於東方六國日佔優勢。前281年，楚人指出秦在當時國際環境中的形勢：「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羽，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³⁷ 從楚人的說話中，反映了秦國的地理優勢，以及其覬覦東方各國的野心。

秦昭襄王時，國力更強。他即位初年，掌握國政的穰侯魏冉繼續對外擴張政策，並舉薦名將白起。白起在秦國兼併戰爭中屢挫東方諸國，對楚、趙兩國更取得驚人成績。白起死後，蔡澤曾經評論他為秦所立的戰功：

³⁰ 《史記》，卷七九〈范雎蔡澤列傳〉，頁2422。

³¹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一書對秦國推行軍功爵制改造社會有詳細的分析（頁317-71）。

³² 《史記》，卷四四〈商君列傳〉，頁2231。

³³ 《吳子》，收入于汝波、李興斌（主編）：《中國經典兵書》（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上冊，卷上〈料敵〉，頁137。

³⁴ 《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頁2293。

³⁵ 同上注，卷七九〈范雎蔡澤列傳〉，頁2408。

³⁶ 同上注，卷七〇〈張儀列傳〉，頁2284。有關巴蜀對秦國的重要性，可參史念海：〈論戰國時期稱雄諸侯各國間的關係及其所受地理環境的影響〉，頁334-36。

³⁷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31。

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³⁸

范雎取代穰侯出任秦相後，以「遠交近攻」之策，使秦國攻取山東六國更為有效。長平之戰也是在范雎的規劃下發生的。長平戰前，秦國力甚盛，³⁹ 東進之心有增無已，東方六國均處於秦的侵逼下。可以說，秦作為一方，東方六國作為另一方，雙方正處於「持續敵對」的格局之中。長平之戰的爆發就是在這一格局中醞釀而成的。以下試分析山東六國在長平之戰前的情況。

韓國處四戰之地，受各國包圍，難以發展。其國正當秦國東出河南之路，在秦國的遠交近攻之策下，首當其衝，而且反抗乏力，只能不斷割地求和，苟延殘喘。

魏國在文侯、武侯的統治下，盛極一時，更從秦國取得河西之地。不過，梁惠王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⁴⁰ 魏最初與秦在河西競相築城以鞏固據點，其後漸感不支，梁惠王便在河西修築長城，還把國都從安邑遷到大梁，以避秦軍鋒芒。秦最終從魏國手中奪得河西，並進一步蠶食河東。前289年，秦攻取魏河東六十一城，三年後，魏舊都安邑落入秦國手中，整個河東地區淪陷。⁴¹ 魏處境艱難，既失河西、河東，僅存的河內也朝不保夕。長平之戰前，魏信陵君便指出：「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魏不能獨力抗秦，只能步步退縮，委曲求存。戰國後期，魏不斷向秦割地，幾已淪為秦的附庸，「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⁴² 甚至不惜奉秦為帝以媚秦。

³⁸ 同上注，卷七九〈范雎蔡澤列傳〉，頁2422-23。

³⁹ 荀子曾對秦國的鼎盛加以稱讚，據楊寬考訂，其時間即在長平戰前。見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956。

⁴⁰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一〈梁惠王章句上〉，頁10。

⁴¹ 有關秦、魏對河西和河東的爭奪，可參看史念海：〈論戰國時期稱雄諸侯各國間的關係及其所受地理環境的影響〉，頁346-49；杜正勝：〈周秦城市——中國第二次「城市革命」〉，載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頁707-8。

⁴² 《史記》，卷四四〈魏世家〉，頁1857，1856。

南方的楚國領土廣闊，是春秋以來的大國，但在戰國之時，楚國暮氣日深，「其政騷，其民疲」。⁴³張儀便指出「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⁴⁴這如何是秦軍對手？戰國中期開始，楚國飽受秦的侵逼，更有懷王被騙入秦不返之恥。秦取得巴蜀後，乘江、漢上游而下，對楚威脅更大。楚國內政不濟，外為秦逼。長平之戰前，楚國在秦將白起的攻擊下，喪師失地，郢都失陷，需要遷都以避秦軍。

齊國在威王、宣王的經營下，勢力極盛，擊敗了稱雄一時的魏國，更一度與秦東、西並稱二帝。不過，齊湣王時，燕將樂毅率領多國聯軍攻齊，下齊七十餘城。齊國最終雖收復失地，但國力已大為削弱。戰國後期，齊國「事秦謹」，又自恃「不與秦壤界而患緩」，⁴⁵不致直接承受秦的壓力，因而讓秦不斷進攻三晉和楚，並沒有對秦構成任何阻力。

北方的燕國是七雄中力量最弱的，自春秋以來，「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⁴⁶燕國未能扭轉其國小力弱的局面，對秦更沒有反抗能力。

趙國被譽為戰國後期唯一能抵抗秦國的國家。在晉還沒有滅亡，韓、趙、魏三家壟斷晉政時，趙氏人才輩出，經過趙簡子、襄子的經營，趙氏已被時人視為三家中最強的。孫武甚至預測趙氏最終可併韓、魏而有之。孫武的推測雖然不確，但至少反映了時人對趙國潛力的重視。⁴⁷

趙在戰國初期未見突出，至趙武靈王即位，因為感到國際環境中的競爭壓力，在強敵環伺下，遂銳意改革，推行胡服騎射，從而提高軍事力量。

趙武靈王推行改革一年後，便對中山國發起進攻，又西略胡地。前300年，趙「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前296年，趙滅中山而有之。趙實力大增，對鄰國不能不構成震動，特別對於銳意東進的秦國，更為一大威脅。在對中山的戰事進行期間，趙武靈王已在制訂進攻秦的計劃，史載他「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為了完成計劃，他竟「自詐為使者入秦」，「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他的行動使「秦人大驚」。⁴⁸趙武靈王的行動，令秦人驚覺到他的野心。趙不

⁴³ 《吳子》，卷上〈料敵〉，頁137。

⁴⁴ 《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頁2286。

⁴⁵ 《戰國策注釋》，卷一〇〈齊策三〉，頁375。

⁴⁶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頁1562。

⁴⁷ 孫武的預測見於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殘簡《吳問》。此一問題既牽涉《吳問》與孫武的關係，也涉及孫武為何作出這樣的預測。何炳棣有細緻的分析，見何炳棣：〈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載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頁55–68。李零對此問題有不同於何氏的分析，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12–13。

⁴⁸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頁1811，1812–13。

但有抗秦之心，更有先發制人之意，欲採取主動向秦進攻，這是秦人不能忍受的。秦人對此當有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後快，雙方的敵對情緒必然因此加強。由於趙武靈王因內亂而死，他攻秦的構想不能落實。趙國雖經內亂，但實力未損，趙惠文王在藺相如、廉頗、趙奢等賢臣良將的輔助下，屢抗強秦。當時人已指出「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⁴⁹

趙惠文王死後，孝成王即位，由趙威后主政。《戰國策·齊策四》中有一段關於趙威后的記載，頗可反映當時趙國執政者的能力。故事內容大約是：趙威后接見齊國使者時，一開口便連問三個問題：「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齊使甚為不滿，反問趙威后為何不先問候齊王，威后解釋道：「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接著，她又詢問齊的內政，提及齊的處士、能人、孝女、佞臣。⁵⁰可見趙威后深明民為國本的道理，對別國內政亦甚留意，並非居於深宮中不懂政事的女子。趙在孝成王初年，由威后執政，還有廉頗、藺相如、趙奢的輔助，政局頗為安定。

總結上述，可知在韓、魏、楚、燕、齊日益衰弱之際，唯有趙尚有能抗秦。因此，當秦、趙之間為了上黨問題而衝突時，在「持續敵對」的狀態下，秦有意令衝突升級，由一場有限的衝突上升為大規模戰爭。在戰事的過程中，秦不遺餘力進攻，務求一舉摧毀趙的軍事力量，甚至消滅其國。

大戰略與決策者：趙國戰敗原因試析

長平之戰的導火線是秦、趙對韓國上黨郡的爭奪。韓的國土被黃河截分為兩部份，上黨郡處於河北。秦自范雎為相後，推行遠交近攻政策，看準了韓的地理缺陷，認為「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⁵¹遂集中力量進攻韓連接南北的交通線，以切斷韓上黨郡與本部的聯繫，從而奪取上黨之地。前265年，秦攻拔韓的少曲、高平；前264年，秦將白起攻取了韓位於太行山脈通道的陘等九城；一年後，白起領軍攻佔了韓的南陽；前262年，白起又取得韓十城。韓上黨郡與河南本部的聯繫因此被切斷。

在秦的軍事威脅下，韓王忖度形勢，上黨終非韓所能有，只好遣使入秦，以割讓上黨郡求取和平。接著，韓王撤換了不願降秦的上黨郡守，另派馮亭上任，以完成割讓的交接工作。然而，馮亭亦不願降秦。他上任三十日後，遣密使向趙孝成王請降。當時的趙國，趙威后早已逝世，趙孝成王親政。趙王接到上黨郡請降的消息，十分高興，馬上就應否接納上黨郡一事，與平陽君趙豹、平原君趙勝和

⁴⁹ 《戰國策注釋》，卷二〇〈趙策三〉，頁745。

⁵⁰ 同上注，卷一一〈齊策四〉，頁408-9。

⁵¹ 《史記》，卷七九〈范雎蔡澤列傳〉，頁2410。

趙禹討論。結果，趙國派遣平原君接受上黨郡的歸降。對於已到手之地突然為趙所得，秦王十分惱怒，遂於四月派遣王齕領軍進擊。趙亦以廉頗為將，率軍進駐長平，接應上黨軍民，抵禦秦軍。最初，趙軍攻擊秦軍斥候不利，裨將趙茄為秦軍所殺。六月，秦軍已攻破趙軍的兩個障塞，破趙軍四尉。自七月開始，廉頗以連番失利，認為不可與秦軍硬拼，遂利用秦軍遠道而來，補給線較長的弱點，改為堅壁不戰，打算與秦軍進行消耗戰，以疲憊秦軍，逼使其撤軍，或給予趙軍可乘之機，以擊敗秦軍。雖然秦軍仍然能夠取趙二尉，破其陣，並奪其西壁壘，但廉頗固守不戰，令秦軍無計可施，戰場上陷入了膠著狀態。

廉頗的堅壁待敵戰術雖對秦軍構成威脅，卻招致趙王不滿，認為他畏懦不戰。秦國正謀求突破戰場上的僵局，范雎開始從事間諜活動，派人在趙國散播流言，說：「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⁵²結果，趙王不理反對，以趙括代替廉頗出戰長平。同時，秦王秘密以白起為上將軍，往前線代替王齕。趙括到達長平後，盡數變更廉頗的約束，又易置軍吏，不再堅壁不戰，反而主動出擊。白起一方面派出奇兵進行迂迴，一方面與趙軍接戰佯退，引誘趙軍追擊。趙括追擊直至秦軍營壘前，遭到了秦軍堅拒。此時，趙軍進既不得，退亦不能，因為白起派出的兩路奇兵，一路已迂迴至趙括之後，切斷趙括與趙軍營壘的聯繫，使趙括陷於包圍之中。秦軍另一路奇兵則迂迴至趙軍營壘之後，切斷了趙軍的糧道。趙括被圍，只好轉入野戰防禦，就地結陣防守，以待救援。

此時，秦王已決心將有限的、局部的戰事轉化為全面戰爭，秦王、范雎、白起的目的是要進行一場殲滅戰。秦王得悉趙軍糧道已絕，為了阻斷趙國對趙括的救援，以便圍殲趙軍，便「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秦國投入龐大力量以殲滅戰場上的趙軍，即使趙王也坦言「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趙括被圍四十六日，糧盡援絕，趙軍已經互相殘殺而食。為了突圍，趙括將軍隊分為四隊，輪番衝擊，卻未能成功。最後，趙括親自率領精銳上陣肉搏，結果中箭而死。主將一死，趙軍大亂，抵受不住秦軍的攻擊，只好投降。白起受降後，認為「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⁵³遂殺降卒。是役趙軍累積死者約四十五萬人，是戰國史上最慘烈的一戰，也是趙國一次空前的軍事災難。

前251年，燕國相栗腹便指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⁵⁴其時距離長平之戰已近十年，可見打擊之大。人口銳減，特別是青、壯年男子大量死亡，必然使

⁵² 同上注，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頁2334。

⁵³ 同上注，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頁2334；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頁2371；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頁2335。

⁵⁴ 同上注，卷三四〈燕召公世家〉，頁1559。栗腹以此說服燕王攻趙，結果燕軍被擊敗。這除了反映出趙軍尚有一定實力，也是燕國太弱之故。

趙的軍事力量削弱，也因為失去大批勞動力而影響趙國的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長平之戰的結局在於戰國後期唯一有可能對秦構成阻礙的趙國受到嚴重削弱，令各國不能抗秦之勢更顯突出，最終為秦逐個擊破。

趙國之敗，作為戰場上全權指揮的統帥趙括，其策略部署導致趙軍慘敗，當然難逃罪責，但並不能完全歸咎於他。趙孝成王等中央決策者決定以趙括取代廉頗，在事後看來，當然是導致趙國戰敗的重要因素。趙國的中央決策者為何選用趙括？他們在戰前與戰事中的表現如何影響戰局？這些問題是本文探討的重心所在。以下，筆者嘗試透過對趙國的大戰略，及有關決策者的分析，探討趙國戰敗的原因。筆者認為趙國最高決策層在面對秦軍的挑戰時，始終沒有制定穩定的大戰略取向，而只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敷衍應付，遂使其目標既不清晰，手段也未能配合，欠缺一貫，結果是和戰不定，徘徊於和戰之間，最終影響了前線趙軍的鬥志。

近代西方戰略家視大戰略 (grand strategy) 為最高級的戰略，「就是協調和指導一個國家 (或是一群國家) 的一切力量，使其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⁵⁵ 大戰略既包括運用軍事力量，也包括應用經濟、外交、道義等非軍事範疇的力量。換句話說，它協調了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軍事等武力與非武力的因素，從而規範了國家最基本的、總體的行動方向。而且，大戰略的眼光不局限於戰爭，它還超越戰爭，看到戰後的和平，以達致對己有利的和平。國家的決策者在制定大戰略時，必須有清晰和固定的目標，在朝著目標前進時，需要適應環境，運用不同的手段達致目標。大戰略的取向可分為三：妥協 (accommodation)、防禦 (defensive) 和攻略 (offensive)。⁵⁶ 不論選擇哪一個取向，均需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才能取得成效。大戰略其實處於不斷發展之中，並非一成不變，但目標必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為若重點不明，整個戰略部署即失去依據，並可能使全局陷於混亂，招致災難性的後果。

《孫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重要兵家著作，頗可代表當時的軍事思想。它開篇即強調廟算的重要性，指出「多算勝，少算不勝」，⁵⁷ 認為只有透過廟算，衡量敵我雙方從內政至軍力等各方面的力量對比，在知彼知己的情況下，才能夠參與戰爭，

⁵⁵ 李德哈特 (B. H. Liddell-Hart) (著)、鈕先鍾 (譯)：《戰略論：間接路線》(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405。

⁵⁶ 學者對大戰略的取向有不同的分類，其中以江憶恩的三分法最為全面，見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2–13。

⁵⁷ 曹操等 (注)、楊丙安 (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上〈計篇〉，頁20。

這其實就是制訂大戰略的先決條件。在春秋戰國史上，先廟算而後戰的例子並不罕見。但馮亭請降，趙王不但不聽勸告，反而予以接受。他似乎沒有顧慮秦國的反應，也沒有計算一旦發生軍事衝突，秦、趙之間將誰勝誰負。當時，趙王似乎只考慮利之所在。

趙王傾向於接受馮亭的請降，理由有二：（一）他相信馮亭使者所言「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的理由，認為是「人懷吾義」；（二）他視接受上黨郡為極大的利益，他向平陽君趙豹表示「夫用兵百萬之眾，攻戰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十七，何故不為？」顯示了他對於不戰而得地的強烈渴望。然而，趙豹卻認為，「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⁵⁸ 趙豹深悉秦的計劃，是要逐步蠶食韓的土地，這次切斷韓的國土，目的是要取得上黨，趙若受降，就是與秦爭利，衝突在所難免。趙豹亦看穿了馮亭請降，並非因為韓人懷趙國之義，不過是借趙抗秦之計。事實上，馮亭心懷韓國，他在派遣使者至趙請降前，便對下屬說：「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⁵⁹ 趙豹深知箇中虛實，認為接受上黨弊大於利。但趙王不聽，並徵詢平原君與趙禹的意見，二人的意見與趙王相同，均認為「用兵踰年，未得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⁶⁰ 君臣之間只考慮接受上黨之利，卻不考慮後患之所生。

當秦國起兵來爭，而趙軍遇到挫折時，廉頗採取堅壁不戰政策，務求與秦軍展開消耗戰。趙王對此既不諒解，亦感不安。他不滿廉頗的保守戰略，又因為受挫於秦而開始失去繼續作戰的決心。趙王十分矛盾，一方面表示「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的想法；另一方面，接受樓昌「發重使為媾」的建議，轉而傾向與秦言和。雖然虞卿提出反對，認為秦一心亡趙，和議必然不成；即使真的議和，也應該先「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⁶¹ 虞卿洞悉秦國懼怕各國聯合，因而主張趙王交通魏、楚，以威脅秦，從而爭取更有利的和談。但趙王不從，反而直接派遣使者入秦媾和。結果，秦國留趙使不放，並以此向各國顯示趙國有求和之心，以消解各國支持趙國的意圖，趙國從而失去合縱抗秦的機會。趙王最初對上黨之地採取攻略取向，至秦軍來攻時，轉入防禦，本來無可

⁵⁸ 《戰國策注釋》，卷一八〈趙策一〉，頁638。

⁵⁹ 《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頁2332-33。

⁶⁰ 《戰國策注釋》，卷一八〈趙策一〉，頁638。

⁶¹ 《史記》，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頁2371。

厚非。但他作戰之心不堅，轉而求和卻又不顧後果，亦沒有計劃以合縱對抗秦國，待得求和不成，唯有繼續作戰，徘徊於防禦與妥協之間，這兩個取向之間其實是沒有矛盾的，但問題在於趙王沒有足夠的手段以達成任何一個目標。究竟是和是戰？趙孝成王及其謀臣似乎沒有全盤計劃，目標模糊不清，處處被動。最後，他們更以趙括代替廉頗為趙軍統帥。趙括統軍後，放棄了廉頗進行持久戰、消耗戰的方針，改為進行運動戰，務求速戰速決，遂由防禦態勢轉入了進攻，最終把趙軍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趙括到達前線後，立刻變更了廉頗的作戰部署。他主動出擊秦軍，往往被理解為其「紙上談兵」的表現。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們今天已無法知曉趙括的實際指揮能力究竟如何。不過，若將他的行動視為胡亂出擊，似乎過於輕率。根據《戰國策》所載，長平之戰期間，「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⁶² 據此，趙國在長平之戰中已陷入糧食短缺的困境。趙國大量壯丁投入長平戰場，一方面必然令國內勞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前線兵馬需要大量糧草供應，運糧的隊伍也對糧食造成數量可觀的消耗，更不必提國內巨大的糧食需求了。因此，趙國出現糧食缺乏的問題不足為奇。在面對糧食供應匱乏的困境時，齊國又拒絕施以援手，可能進一步激發趙王撤換堅壁不戰的廉頗，改派趙括主動出擊，以打破僵局，在戰場上取勝，從而解決糧食問題。

問題是，以趙王為代表的中央最高決策層既沒有制訂穩定的大戰略取向，還有可能錯估了趙括的能力，因而以趙括代廉頗。在前線上，趙括所犯的錯誤在於沒有衡量形勢、了解敵情便貿然出擊，因而墮入了秦軍的陷阱。更不幸的是，秦國誘使趙王以趙括出戰，而趙括的對手，卻換成了秦國的名將白起，趙括就更沒有勝算了。

戰場上另一方的秦國，卻始終目標明確清晰，一直堅持攻略取向，就是要透過此一戰摧毀趙國的力量。因此，秦國傾盡國力，把力量投注在長平，一心決戰，甚至以割讓垣雍之地，利誘魏國放棄援趙。⁶³ 秦國在大戰略上目標穩定，並利用軍事、外交、用間等手段配合目標，終於取得戰場上的勝利。

秦國的用間對其取勝尤為關鍵。《孫子·用間篇》曰：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

⁶² 《戰國策注釋》，卷九〈齊策二〉，頁347。齊不救趙，正反映了六國合縱不堅，予秦以可乘之機。

⁶³ 《戰國策注釋》，卷二五〈魏策四〉，頁936。垣雍之地本屬魏，後失於韓，韓以其地獻秦。因為其地南有滎澤，如果秦軍決滎澤，便可水淹大梁，魏國因而甘願服從秦的要求，以求取得垣雍。

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⁶⁴

《孫子》強調用間的重要性，重視情報搜集工作，認為「知敵之情」是「先知」，是戰爭勝敗的重要關鍵。在長平之戰中，我們看到秦國用間之妙。秦國並非徒恃武力，對情報系統亦十分重視。秦國必然是探知了趙王對廉頗有不信任之心，才能夠散播流言中傷廉頗；也必然是知道趙括不及廉頗，明白他的弱點，知道由他統軍必然對秦軍有利，才會鼓動趙王以趙括為將。

趙括是趙國名將馬服君趙奢之子，趙奢曾在閼與會戰(前269)中擊敗秦軍。趙奢的勝利，必然使秦國對他十分留意，並及於他的兒子，因而秦國認識到趙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知道「破趙軍者必括也」。⁶⁵因此，秦國才會以離間計設法讓趙王任用趙括。可見，秦國透過精密的情報搜集工作，已經掌握了趙王對廉頗的態度、趙王的意向，以及趙括的能力，從而達到了「先知」的效果。秦國巧妙用間，配合其君臣上下的目標，以及白起的戰術得宜，最終取得勝利。

趙孝成王為何接受上黨之降？為何寧用趙括而棄用廉頗？探討這些問題，也就是進一步分析趙國決策層的缺點所在。因為趙國決策者的弱點被秦國洞悉，並加以利用，才令趙國為秦國營造有利環境，製造了取勝的必要條件。決策者的心理狀況、個人考慮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往往影響大戰略取向的決定，這在古代社會中影響力尤大。分析決策者何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選擇取捨，亦符合戰略研究中，日益重視大戰略國內基礎的取向。⁶⁶

趙孝成王是趙惠文王之子、趙武靈王之孫。趙武靈王晚年，一方面立王子趙何為王，即趙惠文王，另一方面，卻又封長子趙章於代，為安陽君。趙章素來不滿弟弟得立為王，因而結聚黨羽，圖謀篡位。後來，趙章起兵作亂，事敗身死，趙武靈王也因亂事而餓食沙丘宮。趙惠文王即位後，可能鑑於宗室相殘的教訓，因而較為重用有才能的異姓大臣，如廉頗、藺相如、趙奢等。他也似乎能夠不拘一格用人，例如藺相如為宦者令繆賢的舍人，地位卑微，趙惠文王卻能信任他，讓他出使秦國；趙奢本為田部小吏，趙王亦能加以提拔，讓他管理國賦，又讓他統軍抗秦。在趙孝成王親政後，情況卻有所不同。趙孝成王似乎偏向重用宗室，在應否接納馮亭請降一事上，史料所見，趙王只曾與平陽君趙豹、趙禹和平原君趙

⁶⁴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卷下〈用間篇〉，頁289-301。

⁶⁵ 《史記》，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頁2446，2447。

⁶⁶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為這方面研究的代表，強調了國內政治、經濟、觀念等因素對大戰略取向的影響。

勝三人商量，而前朝重臣廉頗、藺相如卻不見被諮詢。趙王最後在平原君與趙禹的附和下接受了上黨之降。

平原君是當時趙國決策核心的一員，在趙國接受上黨郡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於他在長平之戰中的作用，司馬遷曾作出非常嚴厲的批評：「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邯鄲幾亡。」司馬遷不但反對趙國接受上黨，甚至把長平戰敗、邯鄲之圍的責任都歸咎於平原君一人身上。司馬遷在《史記》中先後舉出平原君因不殺美人而失客，被譏為「愛色而賤士」；輕視毛遂，以貌取人；縱容賓客橫行不法；透過信陵君與平原君的對比，突出了「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足以證明了平原君的識見有限。他贊成接受上黨也不過是「無故得一郡，受之便」。⁶⁷ 說他「利令智昏」，不亦宜乎？

當然，我們知道上黨的地理形勢對趙國是重要的。趙國若聽任秦國佔據上黨，秦軍便可憑藉太行山的地利，居高臨下，直指邯鄲。因此，趙國接受上黨，亦有利於在「持續敵對」的格局中，先行佔據有利地勢，以防禦秦軍。這部署本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於趙國的決策者未能執行相應的措施以鞏固所得，並對抗強大的秦軍。從史料所見，趙孝成王、平陽君、平原君、趙禹等人的討論均沒有舉出上黨郡對趙國的地利，趙王等人主張接受上黨的理據是能夠不費一兵一卒，即可獲得上黨之地，首要考慮還是獲取土地利益。雖然，不說不等於不知道、不明白上黨郡的戰略意義，但我們亦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趙國君臣接受上黨是由於計算了該地的戰略價值。歷史上的決策者並不一定如後人所想像般，是經過非常縝密、理性的計算才作出決定的，有時也可能是在不太理性的情況下作出決定，如趙王便可能是認為「人懷吾義」而心花怒放，一意堅持接受上黨郡。

元代胡三省認為「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趙不受上黨而秦得之，亦必據上黨而攻趙。故趙之禍不在於受上黨而在於用趙括」。⁶⁸ 身之指出不論趙國是否接受上黨，秦、趙之戰都是不可避免的，趙國戰敗的原因在於任用趙括。我們亦由此進一步追問趙王何以任用趙括。

上文曾經提及趙王可能因為糧食問題而易將，但為何一定要以趙括代替廉頗？趙孝成王明顯對老將廉頗的信任不如乃父。趙惠文王在前赴秦、趙澠池之會前，廉頗恐怕他被秦人劫持，因而提出趙王若逾期不返，便立太子為王。這樣敏感的要求得到趙惠文王的應許，可見他信任廉頗。反之，趙孝成王對這位「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的趙國良將，卻信任不堅，而以趙括代之。在任用趙括之時，另一前朝重

⁶⁷ 《史記》，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頁2376，2365-68；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頁2444；卷七七〈魏公子列傳〉，頁2382-83；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頁2333。

⁶⁸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五〈周紀五〉胡三省注，頁167。

臣藺相如提出強烈抗議，指出「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⁶⁹ 藺相如其實暗示了任用趙括，必敗無疑。即使趙括的母親引述趙奢之言，並以自身的觀察所得，說明趙括不宜任將，趙孝成王仍然不聽勸告，用之不疑。推測趙孝成王執意任用趙括，可能是因為他一心建功立業，而感到諸位老臣對他反成掣肘，因而銳意任用同是年輕一代的趙括，以求在戰場上取得勝利。而且，他似乎固執於信用自己親手提拔的官吏而任用不疑，例如他以齊人李伯為代郡守後，對於有關他造反的傳聞一概置之不理，⁷⁰ 這與他對待廉頗的態度完全不同。他既搖擺於和戰之間，又拒絕接納反對意見，只以自己的意見為是，可見他偏拗固執的一面。

趙孝成王既然一心求利，但在面對困難時，又意志不堅；他捨棄有才能、經驗豐富的廉頗、藺相如不用，而任用「利令智昏」、「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的平原君。⁷¹ 平原君缺乏識見，從上述《史記》中的例子可知，而且，根據《戰國策》的記載，他在孝成王初年任相，曾捨趙國良將廉頗、趙奢不用，竟然甘願割地以請齊國的田單為將，而田單的軍事才能卻不及趙奢。趙奢對此深為不忿，質問平原君「國奚無人甚也？」⁷² 此一事例只能再次證明平原君識見平庸，也說明了趙孝成王不重視前朝重臣，可能是與平原君互為影響的結果，彼此也有疏遠前朝重臣的心思。⁷³

在大戰略的妥協、防禦和攻略三個取向中，不論選擇哪一個取向，均需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才能取得成效。作為趙國中央的決策者，趙孝成王與平原君皆有著明顯的缺點，在決策上和戰不定，未能清楚釐定目標，自然步調紊亂，模糊了大戰略的方向。至於在前線的趙括，本身能力不足，既沒有衡量秦、趙兩軍的實力對比，又一心決戰求勝，忽視了他的手段根本不能符合目標，終於引致覆軍殺將之禍。

⁶⁹ 《史記》，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頁2443，2446。

⁷⁰ 《戰國策注釋》，卷二〇〈趙策三〉，頁759。

⁷¹ 《史記》，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頁2369。

⁷² 《戰國策注釋》，卷二一〈趙策四〉，頁784；卷二〇〈趙策三〉，頁709-10。

⁷³ 根據一些學者的考證，趙孝成王還重用了一名倖臣建信君，敗壞了趙國的政治。建信君的資料只零星見於《戰國策》和出土趙國兵器銘文中，可參沈長雲：《趙國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00-202。建信君似乎與秦國關係密切，說不定就是秦國在趙王身邊用間的重要棋子。不過，因為沒有資料顯示建信君在長平之戰中的角色，所以本文置而不論。

結 論

前260年的長平之戰，趙軍戰敗，稱雄北方的趙國遭受重創，秦國雖於此戰中虛耗不少，但從其影響而言，仍是對秦國有利的。長平戰後，秦國的實力相對於東方六國更強，從而助長了秦滅六國之勢。對於這一場影響深遠的趙國軍事災難，筆者不同意簡單地把罪責全部歸於趙括，認為這樣既失之偏頗，也過於簡單，故而嘗試對長平之戰及其相關問題進行系統分析。

本文透過「持續敵對」的視角，追溯秦、晉關係至秦、趙關係的演變，指出秦、趙的「持續敵對」意味著兩國之間的大規模決戰終於不可避免。趙國之敗，並非僅在於以趙括擔任戰場上的指揮，其根源在於趙國的內政基礎，也就是趙孝成王與平原君等中央決策者的決策失誤，造成了大戰略的失調、混亂。同時，前線上的趙括也有失誤。從上而下均有失誤，反映了趙國大戰略的不穩定性，最終造成了趙國戰敗的根本原因。當然，秦國的大戰略取向穩定、清晰，適當調動各種資源，巧妙用間，切斷趙國的外援，並以名將白起統軍，俱促成了秦國在兩強傾全力相鬥之中，最終能夠戰勝趙國。

在古代社會，君主及其重臣對大戰略的取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趙孝成王的偏執與平原君的才能平庸，不可避免地影響了趙國大戰略的取向。趙國的決策者徘徊於和戰之間，手段與目標不能配合，而且目標也欠缺清晰和穩定，其走向失敗的結局便無可挽回了。

補 記

在有關長平之戰的研究中，趙軍死亡人數及白起有否阬殺降卒是歷來討論的重點之一。本文並未參與此一討論，故略綴數語於此。

涉及此一課題的論著不少，可參看藍永蔚、靳生禾、謝鴻喜、洪金富及Robin D. S. Yates諸家之說。⁷⁴

⁷⁴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8-11；靳生禾、謝鴻喜：《長平之戰——中國古代最大戰役之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5-22；洪金富：〈四十萬蒙古說論證稿〉，載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296-302；Robin D. S. Yates, “Early China,” in *War and Society i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 Asia, the Mediterranean, Europe, and Mesoamerica*, ed. Kurt Raaflaub and Nathan Rosenstei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p. 40, n. 97。

當中，以洪金富一文尤有新意。洪氏從檢討中國歷史上「四十萬」這個數字入手，認為國史上「四十萬」之數多不可信，因而否定白起阬殺四十萬趙卒之說。⁷⁵

對這一歷代聚訟不休的公案，筆者認為，綜合《史記》和《戰國策》所載，趙國在整個長平戰役中，死亡人數累積達四十多萬，未可遽爾否定。不過，對於一些問題，如四十多萬人是否全為趙軍，或者有一定數量的韓國軍民？這些人的死亡是如何造成的？白起是否一次過阬殺四十多萬人？在缺乏新資料的情況下，於現階段對這些問題實難下定論。

⁷⁵ 洪氏一文承陳學霖教授檢示，謹此致謝。

The Battle of Changping (260 B.C.): A Military Disaster Caused by Inconsistent Grand Strategy

(A Summary)

Tse Wai Kit

The Battle of Changping (260 B.C.) was the most famous battl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Zhao Kingdom suffered a colossal loss, in which a heavy casualty of over 400,000 was reported.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opinion, the incompetence of Zhao Kuo, commander of the Zhao army, was condemned for the catastrophic defeat. However, the author wonders whether Zhao Kuo should have borne sole responsibility, and attempts to reassess the domestic side of the Zhao politic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military disaster.

The author uses the concept of “Enduring Rivalries” to tr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 and Zhao kingdoms, and to explain why a limited conflict would escalate to a large-scale war. We could argue that Zhao’s defeat was caused by inconsistency in grand strategy. Facing a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the decision makers of Zhao did not envision such a strategy; consequently, they caused gaps and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means and ends. Lacking a firm foundation of grand strategy, the military disaster became inevitable.